

沈从文论鲁迅: 从游移到认同

吴投文

(湖南科技大学 中文系, 湖南湘潭, 411201)

摘要: 在鲁迅逝世前沈从文他对鲁迅的认识与评价游移于疏离与接受之间, 表现出一种复杂难解的矛盾态度。鲁迅逝世后, 他视域中的鲁迅, 逐步还原为一个真实而完整的形象, 表明他对鲁迅的认识与评价已由游移归于认同。沈从文在 40 年代后期对鲁迅态度的大幅度改变, 是多种因素综合性影响的结果。他对鲁迅学术贡献的肯定, 对鲁迅杂文的重新评价和对鲁迅人格气度的推许, 都表明他已摆脱过去偏狭的“纯文学”视角, 开始用一种综合性的眼光来认识与评价鲁迅。

关键词: 沈从文; 鲁迅; 游移; 认同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4)01-0081-05

在鲁迅逝世前, 沈从文就多有著论及鲁迅的文字。从这些文字中, 可以发现沈从文在对鲁迅认识与评价上的复杂性。沈从文从文学本体论出发, 一方面肯定鲁迅在小说创作上的重要成就, 对作为文学家的鲁迅持认同态度, 另一方面又否定鲁迅的杂文创作及其社会政治意义, 对作为思想家与战士的鲁迅表现出拒斥的态度, 对鲁迅的人格气度也颇多微词。这就使得这一时期沈从文对于鲁迅的认识与评价游移于疏离与接受之间, 表现出一种复杂难解的矛盾态度。从沈从文的这一矛盾态度中, 不仅可以把握到两位文学大师在文学观念与社会政治立场等许多重要方面的深刻歧异, 而且对于我们正确地认识长期以来众说纷纭的两位文学大师的关系问题, 似也不无益处。笔者对此有专文探讨, 在此不再赘述^[1]。鲁迅逝世后, 沈从文对鲁迅的认识与评价发生极大的转变, 表现为从游移逐步趋向认同, 发展到建国初期, 则自觉地把对鲁迅的认识与评价纳入到时代的主流话语体系中。沈从文在对鲁迅认识与评价上的这种转变, 是深意味的, 值得作深入的探讨。

一九三六年十月, 鲁迅的逝世成为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 产生的社会影响十分巨大。当时左中右各派政治势力都借此机会进行各有目的的舆论宣传。而各种各样的悼念活动和不计其数的纪念文章则表明, 鲁迅已经作为民族魂, 成为民族精神的一种象征。沈从文对这一文坛的重大事件不可能没有感

想, 但他保持沉默, 采取一种独立不倚的超然姿态。直到一九三七年八月发表《再谈差不多》一文, 才意味深长地提及对这一事件的看法: “最好的回答倒是鲁迅先生的死, 被许多人称为‘中国最伟大人物’。伟大何在? 都说他性格、思想、文章比一切作家都深刻。‘比一切作家都深刻’, 这是从万千纪念文章中抽出的结论! 倘若话是可靠的, 那鲁迅先生却是个从各方面表现度越流俗最切实的一位。倘若话是不可靠的, 那一切纪念文章都说错了, 把鲁迅先生的伟大估错了。”接下来则说“护短为近代中国作家一个特色”, 不无弦外之意。一九三六年十月, 沈从文发表《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 针砭文学创作中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他把这种现象概括为“文章内容差不多, 所表现的观念差不多”, 引起文学界一年有余的热烈讨论, 形成颇具声势的“反差不多运动”。《再谈差不多》一文是沈从文在这次讨论中的回应文章。在沈从文看来, 那些缅怀鲁迅先生的“万千纪念文章”也都“差不多”, 有“估错”的可能性。尽管他也在文中提倡作家“走鲁迅那么一条比一切深刻的路”, 但他显然对那“万千纪念文章”持保留态度, 他并不认为鲁迅是“中国最伟大人物”。

鲁迅在沈从文此后的文章里仍然常常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值得注意的是, 此后他对鲁迅的基本评价似乎有些微妙的变化, 他更多的是把鲁迅作为一个研究对象予以观照, 对鲁迅的评价趋向平实与客

观,很少再有那种尖刻的讽刺。1940年4月发表的《白话文问题——过去当前和未来检视》一文,在回顾自新文学运动以来白话文的演变历程时,把鲁迅列为现代白话文学的开创者之一。沈从文认为白话文取代言文成为文学的正宗,“得归功于第一期对语体文抱有美丽幻想与坚固信心的几个作家。其中最主要的是胡适之、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鲁迅、周作人……那种勇于尝试的进取精神以及狂热诚实的工作态度,特别值得敬重。”在他看来,这些先驱者的贡献在于或从尝试中有所建设,因此作品成为二十年来的模范;或从尝试得到失败的经验,也给后来者在方法上有修正的机会。随后他分类列举各种文体取得的成绩,肯定周氏兄弟在散文方面“用带抒情方式叙述人事”取得的成功。至于在小说方面,“叶绍钧、王统照、冰心、鲁迅一批作者在试验中得失互见,因得失互见,给予后来者一种‘自由竞争’便利。各自为战,人才辈出,成绩也就特别好。”他在提到白话文学产生的社会影响时,特别指出“鲁迅、冰心、茅盾、丁玲、巴金、老舍几人的名字,竟成为青年学生极熟悉的名字”。同年六月发表的《读〈论英雄崇拜〉》一文,在提及现代文体改革的成功时,再次指出鲁迅作品的历史意义,认为“二十年前的改造运动,从最小处言,很明显即因工具运动(文体改革)成功,方起新陈代谢作用。通俗小说中旧的如《封神演义》,新的如《玉梨魂》等书,代之而来产生冰心、鲁迅、茅盾、巴金的作品”。应该说,沈从文是以比较客观的态度来评价鲁迅在现代白话文学开创期的历史性贡献的。

1940年沈从文还有几处关于鲁迅的重要文字,此时他对于鲁迅的认识,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方面仍然徘徊在以前的认识与评价上,造成他在论及鲁迅时,常有一种游移不定含糊其辞的矛盾心态;另一方面,显然已经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鲁迅,能够较为准确地把握到鲁迅的文学史地位,对鲁迅艺术风格的揭示也多有独到之处。这年9月发表的《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一文,因采取把鲁迅与周作人对比的视角,就在旧调重谈中显出一点新意,给人不无启发。其一,沈从文清楚地意识到,周氏兄弟的作品就其表现思想观念的方式而言,实在是“不宜相提并论”的。在他看来,周作人的作品“近于静静的独白”,“充满人情温暖的爱,理性明莹虚廓,如秋天,如秋水,于事不隔”。而鲁迅的作品则“近于恨恨的诅咒”,“充满对于人事的厌憎,情感有所蔽塞,多愤激,易恼怒,语言转见出异常天真”。与此相联系,

沈从文认为,“周作人的小品文,鲁迅的杂感文,在二十年来中国新文学活动中,正说明两种倾向,前者代表田园诗人的抒情,后者代表艰苦战士的作战”。其二,沈从文认为,尽管兄弟两人的差异是如此之大,作品的出发点却是相同的,“同是一个中年人对于人生的观照,表示感慨”。沈从文在对两人的比较中试图异中求同,也许不无牵强之感,但自有他的见地。他同时指出,两人在洞明人生上可谓“同源而异流”,只不过周作人“取引退态度,只在消极态度上追究人生,大有自得其乐意味”。而鲁迅则“取迎战态度,冷嘲热讽,短兵相接,在积极态度上正视人生,也俨然自得其乐”。而发展到极端,便是周作人的作品“走上草木虫鱼路上去,晚明小品文提倡上去”。而鲁迅的作品则“对社会取应战态度”,“充满与人与社会敌对现象,大部分是骂世文章”。其三,沈从文认为,鲁迅的文章有两方面的长处。一是“纯抒情作风的长处”,如《野草》和他的大部分小说,都浸透一种“素朴的田园风味”,而这种抒情作风“无不见出与周作人相差不远的情调。文字从朴素见亲切处,尤其相近”。沈从文还特别指出,这种抒情作风“与他当时译《桃色的云》、《小约翰》大有关系。与他的恋爱或亦不无关系”。鲁迅作品的“另外一种长处是冷嘲,骂世”。这类文章对社会现象表示意见时,取迎战态度,如《纪念刘和珍君》等文章“感慨沉痛,在新文学作品中实自成一格”。另外如《二丑艺术》等,则对社会取冷嘲态度,对人生世相的揭露入木三分。应该说,沈从文通过这些对比,对周氏兄弟人生取向的分歧和艺术风格的异同不无独具慧眼的揭示,但最后却得出来一个空泛的结论,认为周作人属于“为艺术的艺术”,而鲁迅属于“为人生的艺术”。尽管沈从文并没有明确地表示两者孰优孰劣,但在他暧昧不明的态度里,潜藏着一种纯艺术论的调子,他的倾向是不言自明的,他显然对周作人有一种出自深心里的认同和偏爱。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与1934年在《鲁迅的战斗》一文中彻底地否定鲁迅的杂文相比,尽管那种调子在这里也不无回响,他显然还不能认同鲁迅的战斗风格,但仍可以发现一些微妙的变化,一是不再对鲁迅的战斗进行刻薄的讽刺,二是承认鲁迅式的冷嘲与骂世也是一种长处,三是认为鲁迅的小品文有一种抒情的倾向,表明沈从文已经注意到鲁迅杂文的艺术性。

1940年十月发表的《由冰心到废名》二文稍晚于上文,则出人意外地把鲁迅和徐志摩进行比较。沈从文认为,“从作品风格上观察比较,徐志摩与鲁迅

作品,表现的实在完全不同。”徐志摩“给读者的印象,正如作者被人间万汇百物的动静感到眩目惊心,无物不美,无事不神,文字上因此反照出光彩陆离,如绮如锦,具有浓郁的色香,与不可抗的热”。而鲁迅“却好象凡事早已看透看准,文字因之清而冷,具剑戟气。不特对社会丑恶表示抗议时,寒光闪闪,有投枪意味,中必透心。即属于抽抒个人情绪,徘徊个人生活上,亦如寒花秋叶,颜色萧疏”。应该说,沈从文对两人作品风格的概括是有见地的,能准确地揭示出两人风格的差异。他同时指出,两人“不同之中倒有一点相同,即情感黏附于人生现象上(对人间万物的现象),总象有‘莫可奈何’之感”。这种“‘莫可奈何’之感”在徐志摩身上表现为“‘求孤独’的意愿”,因而“对‘现世’有所退避”;在鲁迅身上表现为“对于静寂的需要与向往”,因而习惯于“向‘过去’凝眸”,在沈从文看来,这是“对现世退避的另一形式”。与此相联系,沈从文认为,“对‘当前’起游离感或厌倦感,正形成两个作家作品特点之一部分”。两位作家的这些异中之同或许是沈从文独到的发现和感悟,但与人们对鲁迅作品的惯常理解显然格格不入,加之沈从文对此语焉不详,难以让人相信两位作家之间真有这样一个契合点。在沈从文的视域中,鲁迅似乎分裂为两个形象,作为战士的鲁迅和作为隐士的鲁迅。或者说,一个积极的鲁迅和一个消极的鲁迅。也许沈从文意在揭示鲁迅的复杂多面性,但这样两个对立的鲁迅显然是无法统一起来的。倒是从中见出沈从文对于鲁迅游移不定的矛盾态度。从中也不难看出,来自文学观的限制和对于鲁迅作品一定程度上的误读,加之受到惯性思维的影响,使沈从文仍然难以摆脱对鲁迅复杂难言的矛盾态度。他难以克服对鲁迅精神世界的陌生感,他对于鲁迅游移不定的矛盾态度因而显而易见地在文中流露出来。

与沈从文这种游移不定的矛盾态度相关,他对鲁迅的认识与评价不时发生摇摆,出现反复乃至倒退。40年代初,沈从文极力提倡文学运动的重造,呼唤一种新型文学观的出现,认为这对于国家与民族的重造至关重要,要求作家用诚实的态度创作出优秀作品,以此来推动国家和民族的重造。1940年八月发表的《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一文集中地反映出这一观点。他在文中回顾自1926年文学与商业结缘,1929年又与政治合流以来,文学运动就呈现出堕落的趋势,作家诚实的创作态度日益被文学的商业化和政治化倾向所取代。但沈从文还是认

为,尽管鲁迅等“不少人已近中年”,但抱着“一个比较远大理想,心怀宏愿与坚信,在寂寞中来努力”,正是有这种诚实的创作态度,“方有许多优秀示范作品继续产生”。两年后发表的《文学运动的重造》一文重申文化运动重造的重要意义,在论及文学商业化趋势的危害时,不无讽刺地说,“凡事从‘生意经’着眼,五四谈男女解放,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所以过不了多久,南方就有张资平多角恋爱小说出现,北方就有章衣萍《情书一束》出现。(后来甚至于年过半百的鲁迅先生,也在书店的怂恿下,印行了他的内容并不香艳名称却极动人的《两地书》。)这些作品当时都得到广大的销路。”结果风气所归,“造成一时社会赚钱法门”。沈从文在这里把《两地书》的出版理解为一种商业行为,无异于在创作态度上把鲁迅与海派作家混为一谈,显然与他1934年发表的《论“海派”》,特别是1940年发表的《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一文中对鲁迅创作态度的褒扬相矛盾,从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见出沈从文对鲁迅精神世界的隔膜感与陌生感。他似乎并不理解《两地书》并非风月之谈,而是借心灵对话抒写时代风云的杰作。沈从文不遗余力地针砭文学的商业化,显示出他倡导文学摆脱商业实利、标举文学本体的远见卓识。但把矛头指向鲁迅,则显然失之偏颇,无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推究这种矛盾态度的因由,既有来自沈从文文学观上的限制,也有对于鲁迅作品一定程度上的误读,也不无惯性思维的影响和来自人事关系上的纠结。

沈从文认为,“新文学与政治真正发生关系,实在它和商业发生关系以后。”^{[21](280)}因此,在针砭文学商业化的同时,沈从文也大力抨击文学政治化的倾向。值得注意的是,他把鲁迅与这种恶劣的倾向联结在一起。在沈从文的视域中,始终存在着一个政治化的鲁迅,只要稍加检视他论及鲁迅的文字,就不难发现这一点。1928年,革命文学内部发生论争,新起的太阳社和后期创造社都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鲁迅,指斥鲁迅是时代的落伍者,已经成为革命文学的障碍。鲁迅痛心于“革命文学家”背离艺术规律,把文学视为政治工具的极端言论和恶劣的人身攻击,愤而反击。沈从文在1943年1月发表的《“文艺政策”检讨》一文中,肯定五四时期“用笔作工具向社会挑战的胡适和鲁迅”,认为他们“与军人似乎不相干”。在他看来,文学在当时没有被军阀政府所利用和控制,是文学独立性的表现。但接下来他在回顾“革命文学”论争这一事件时却说,“把初期左翼文学

讽刺得最深刻的,不是政府方面的论文,却是鲁迅在《奔流》上骂《太阳社》作家几篇文章。(钱杏村为答覆这种讽刺,在十七年太阳杂志,把鲁迅骂得一文不值。到十九年再做一文,却因为合作,把鲁迅称为最革命的作家了。这说明文学与政治混为一事,不问是非真伪的包庇性,可能到如何程度。)”沈从文对“当时的‘革命文学’,固无什么真实有价值作品”,却热衷于政治运动极为反感。尽管他认为鲁迅对这一现象嘲讽得最深刻,却是凭“骂”取胜,与“革命文学家”用的是同一技法,他对此显然是不以为然的。他对鲁迅因为与左翼作家“合作”,从最初被“革命文学家”骂得一文不值转而又被他们称为最革命的作家,尤其痛感于心。这种“不问是非真伪的包庇性”,与他所极力倡导的文学独立原则是水火不容的。在他看来,鲁迅的战斗与政治的关系太过密切,这也是他对作为战士的鲁迅一向没有什么好感的重要原因。

在1947年底沈从文基本上终止文学创作之前,他还有多处论及到鲁迅的文字,涉及到鲁迅的多个方面。如1941年3月发表的《变更作风》一文,在论及报纸副刊的作用时说,“民八以后梁任公、胡适之等人的学术论著,罗素、杜威的演讲词,以及男女解放社会改造各问题,鲁迅、冰心新文学作品与读者对面,都是由副刊来负责的。它的作用大意义深,是有目共见的。”1946年9月发表的《怎样办好一份报纸》一文,在重提报纸副刊的作用时说,“近二十年新作家的初期作品,更无不由副刊介绍给读者。鲁迅的短短杂文,即为适应副刊需要而写成。”1947年9月发表的《新废邮存底·二十二》一文,在提及编辑与作家的关系时说,“现代文学史许多举例示范作品,当时似乎即半由编者催逼而成。鲁迅之阿Q,由孙伏园先生催生。”至于在1945年8月发表的《湘人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一文,则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论及到鲁迅乡土题材的小说对湖南作家黎锦明的影响,这是沈从文曾多次提及的话题。尽管这些片言只语都是为行文所需,顺便涉及到鲁迅的,也无不显示出沈从文对于鲁迅某一方面的认识和评价。

在1946年8月发表的《北平的印象和感想》一文中,尽管也只有寥寥数语涉及到鲁迅,但透露出沈从文以全新的眼光看待鲁迅杂文的重要信息,似值得特别注意。沈从文对杂文和与杂文具有天然联系的讽刺手法怀有很深的偏见,一向低估乃至否定杂文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作用,认为“写杂论自然一时节可以热闹些,但毫无用处。”^{[3](18)}对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的讽刺手法,沈从文也极为不满。这成为他对

鲁迅的杂文持基本否定态度的重要原因。但1946年6月重返北平所受到的强烈心理刺激,却使他对鲁迅杂文的看法出现重大转机。眼前的现实无异于一幅最无情的讽刺画面,抗战的胜利并没有带给北平任何新的气象,触目所见,是“用来屠杀中国人的美国坦克”和“六轮大汽车满载新征出发的壮丁”,街上所见到的人也都显出一种衰弱或退化的迹象,他为此深感失望和痛苦。沈从文更痛心于内战的爆发与和平建国理想的破灭。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满目疮痍的北平景象引起他强烈的讽刺冲动,但又痛感于鲁迅富有建设性的讽刺不复再有。因此他在《北平的印象和感想》一文中,对以杂文作为武器战斗至死的鲁迅,发出由衷的慨叹:“鲁迅早死了。讽刺和他同时死去了多年。”这表明由于来自现实的教训,他对鲁迅的战斗精神和讽刺艺术不无发自内心的认同,他已经开始认识到杂文对于现实的批判功能和讽刺手法对于文学的重要意义,这也是后来他在《学鲁迅》一文中高度评价鲁迅杂文的根本原因。

广为人知的《学鲁迅》一文发表于1947年11月,是沈从文为纪念鲁迅逝世十一周年而作的,最为集中地代表他对鲁迅的看法,表明他对鲁迅的认识与评价已由游离归于认同,这是沈从文对鲁迅评价的根本性转变。沈从文在回顾五四文学革命的意义后认为,在五四时期“几个先驱者工作中,具有实证性及奠基性的成就,鲁迅先生的贡献实明确而永久。”他把鲁迅“明确而永久”的贡献概括为后来常为研究者所引用的三个方面:“一、于古文学的爬梳整理工作,不作章句之儒,能把握大处。二、于否定现实社会工作,一支笔锋利如刀,用在杂文方面,能直中民族中虚伪,自大,空疏,堕落,依赖,因循种种弱点的要害。强烈憎恶中复一贯有深刻悲悯浸润流注。三、于乡土文学的发轫,作为领路者,使新作家群的笔,从教条观念拘束中脱出,贴近土地,挹取滋养,新文学的发展,进入一新的领域,而描写土地人民成为近二十年文学主流。”此外,他一反惯常对鲁迅人格气质的攻击姿态,推许鲁迅“对工作的诚恳,对人的诚恳,一切素朴无华性格,尤足为后来者示范取法。”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这个评价在今天看来并不算高,未能从中国革命和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历史发展着眼去认识鲁迅^{[4](93)},但其可贵之处在于,沈从文对鲁迅人格气度的称许,对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所起作用的评述都能落到实处,尤其是对鲁迅杂文思想价值的评价能出之以公允客观的态度。但若把沈从文对鲁迅的这个具有颂扬性的评

价,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却未免有点出人意外之感。不难发现,沈从文这时对鲁迅的认识与评价有一个大幅度的转变——一个跳跃式的转变。尽管沈从文一直把鲁迅的成就置于中国新文学最重要的位置上,他对鲁迅的评价也一直在不断地调整,但这个评价显然已超出文学的范围,超越过去显得偏狭的视角,显示出一种综合性的评价眼光,因此,在沈从文的视域中,第一次呈现出一个完整而不扭曲的鲁迅形象。

究及沈从文对鲁迅态度这种大幅度转变的原因,可归结为三个方面:其一,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已得到时间的确证,其作品具有无可置疑的经典意义,成为中国新文学传统最为重要的源头。沈从文在审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时,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认为鲁迅的成就“特别值得记忆和敬视”^{[5](286)}。其二,四十年代以来,由于强烈的现实教训,沈从文的文学思想发生重大的变化,呈现为一个矛盾的复合体。他标举的文学独立原则始终无法抗拒现实要求于文学的功利原则,他“向内转”的文学尝试也在现实面前显得孱弱无力,他想归于“抽象原则”,却又被现实强力拉回,沈从文这种复杂的思想状态在其文学观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他固执于文学独立原则,张扬文学本体论,执着于“文学的重造”和“文运的重造”;另一方面,他又具有强烈的现实干预精神,不遗余力地倡导“社会重造”、“国家重造”、“民族重造”,乃至“工具重造”和“生命重造”,这与鲁迅一贯倡导的启蒙主义立场在内在精神上实则是相通的。在40年代后期,他的这种思想

倾向逐步居于主导性地位,这使他在精神上与鲁迅更为接近,这也许是导致他对鲁迅的认识与评价发生大幅度转变的根本原因。其三,四十年代后期中国现实政治对文学的内在要求,也影响到沈从文以新的眼光来看待鲁迅。鲁迅作品因其强烈的政治性内涵和现实战斗精神,符合中国现代革命政治的现实需要,作为一种新的文学范型,长期以来得到左翼文学界的大力提倡,发展到四十年代后期,则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已确立为革命文学的方向。四十年代后期的文学论争表明,坚持鲁迅方向,不只是一个文学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也许沈从文并非有意去迎合这一政治化的文学思潮,但当时严重的社会危机和强烈的现实刺激都促使沈从文反思和调整自己的文学观念,他不无书生气地寄希望于用文学去实现社会重造和国家重造,往深层看,与这种政治化的文学思潮不无某些相通之处。

参考文献:

- [1] 吴投文. 沈从文论鲁迅: 在疏离与接受之间[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2004, (6): 68-72.
- [2] 沈从文. “文艺政策”检讨[A]. 沈从文全集(第17卷)[C]. 广州: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
- [3] 沈从文. 新废邮存底·五[A]. 沈从文文集(第12卷)[C]. 花城出版社, 1984.
- [4] 凌宇. 从边城走向世界[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5.
- [5] 沈从文. 学鲁迅[A]. 沈从文全集(第16卷)[M].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

Shen Congwen's literary reviews of Lu Xun: from alienation to acceptance

WU Tourwe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Before Lu Xun passed away, Shen Congwen had ever made some literary reviews of Lu Xun, from which we can find out Shen Congwen's complexity in the understanding and evaluation of Lu Xun. This period put Shen Congwen in a position between alienation and acceptance as far as the understanding and evaluation of Lu Xun is concerned, which reflected a complex and indecipherable attitude towards Lu Xun on the part of Shen Congwen. But after Lu Xun passed away, the fact that Shen Congwen obviously changed his attitude to Lu Xun reveals that he had changed his understanding and evaluation of Lu Xun from alienation to acceptance.

Key words: Shen Congwen; Lu Xun; alienation; acceptance

[编辑: 颜关明]